

中国 古典 小说 史论

杨 义 著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清客相公審察兩府的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叅度辦事人

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鐵木磚瓦之物搬運

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折

院中營府所蓄下人

一小義斷楊通然

會芳園本是從北角地

石樹雖不敷用賈赦住的

及亭榭欄杆等物皆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



其中樹木山石以

再引其山

以連屬

府雖有

府東大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杨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12

ISBN 7-5004-1756-X

I. 中… II. 杨… III. 古典小说-小说史-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1625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1201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125 插页: 2

字数: 439 千字 印数: 6001—6500 册

定价: 34.00 元

目 录

导言 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阐释和文体发生发展论·····	(1)
一 本体认定和“小说”语义分析·····	(1)
二 小说发端于战国及其互体形态·····	(5)
三 多祖现象之一：子书与小说·····	(9)
四 多祖现象之二：神话与小说·····	(11)
五 多祖现象之三：史学与小说·····	(15)
六 多祖因素和文人诗学灵性的融合·····	(20)
七 小说分类学的产生及其误区·····	(23)
八 民间口传小说和外来宗教文化的撞击·····	(26)
九 文人对小说参与和奇书系统·····	(30)
第一章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	(35)
一 中国神话的大地情结·····	(35)
二 迥异于史诗神话的原始性、非情节性和多义性·····	(37)
三 化生创世和异体合构的野性思维·····	(41)
四 二元对应原则与海外奇思·····	(45)
五 日月神话人伦化与英雄神话·····	(48)
第二章 《穆天子传》的史诗价值·····	(53)
一 战国人把周穆王当作传奇英雄·····	(53)
二 成书年代与魏人的河伯崇拜·····	(56)
三 马神崇拜与八骏配八方之色·····	(62)
四 穆王见西王母的神话史诗化·····	(66)
五 仁霸兼修、悲乐兼备的叙事复调及盛姬之丧·····	(70)
六 文史交叉与韵散交错的叙事谋略·····	(73)
第三章 汉魏六朝杂史小说的形态·····	(79)

一	杂史小说的品位和成书年代	(79)
二	燕、吴、越文化的复仇史诗	(84)
三	汉代杂史小说的时空结构和叙事谋略	(89)
四	杂传小说和道教文化	(96)
第四章	汉魏六朝志怪书的神秘主义幻想	(103)
一	“万物皆灵”与对《山海经》模式的突破	(103)
二	神话世俗化和鬼话人情化	(108)
三	经以人情、纬以神秘的幻想方式	(112)
四	空间幻想：殊域，洞穴，自由空间	(117)
五	时间幻想：古老的权威，仙凡时间的悬殊	(121)
第五章	汉魏六朝“世说体”小说的流变	(126)
一	从依附子书到脱胎于子书	(127)
二	《说苑》储事言政的叙事谋略	(131)
三	《世说》的山水意识和人物品鉴	(136)
四	超越名教和意象叙事	(141)
第六章	唐人传奇的诗韵乐趣	(149)
一	小说诗化和“进士——妓女”母题	(149)
二	主体创造意识和《九歌》余韵	(153)
三	玄怪风中的命运意识和豪侠风中的心理危机	(157)
四	小说和音乐沟通，以及那谈论不尽的开元天宝 盛世	(161)
五	对梦幻世界、潜隐意识和变形艺术的探索	(166)
第七章	敦煌变文的佛影俗趣	(172)
一	“变”字的语义分析和变文的歌场化	(172)
二	变文世俗化过程及其文体发展逻辑	(177)
三	雄丽的综合文体和壮阔的时空结构	(182)
四	在佛教幻想和世俗道教、历史叙事的结合 点上	(187)
五	变文的敦煌地域特色和边塞情思	(192)

第八章	从《酉阳杂俎》到《夷坚志》·····	(200)
一	文人案头文学和南方习俗投影·····	(200)
二	清雅自由的唐人风度和面对怪异的幽默感·····	(204)
三	沉重的人生感受和宋人说鬼的道学气·····	(209)
四	掌故趣味和蛮荒女色的诗意·····	(214)
五	多重声音和时空错综的叙事·····	(218)
第九章	文人与话本叙事典范化·····	(224)
一	话本和文人互动互补的审美动力结构·····	(224)
二	入话和正话的“有意味的错位”·····	(227)
三	由俗趋雅和叙事焦点盲点的调整·····	(231)
四	韵散交错的精致化和审美浓度的增加·····	(235)
五	伪书《京本通俗小说》和宋元话本的叙事 方式·····	(240)
第十章	《三国演义》的悲剧结构和经典性叙事·····	(245)
一	悲剧态势的形成和民间心理原型·····	(245)
二	“战争与人才”母题以及兵、道互渗模式·····	(251)
三	具有结构价值的探听效应和数字组合·····	(256)
四	两极共构的立体动态审美功能·····	(260)
五	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的疏密张弛·····	(266)
第十一章	《水浒传》的整体生命和叙事神理·····	(269)
一	神秘的宇宙意识和参数叙事·····	(270)
二	心理、社会、玄想三层面的结构张力·····	(274)
三	折扇式列传单元和群体性战役板块·····	(278)
四	似真传神主义的叙事谋略·····	(282)
五	以局部限知实现整体全知的流动视角·····	(288)
第十二章	“剪灯三话”的文化意识和叙事谋略·····	(294)
一	百年乱离对传奇笔志怪的刺激·····	(294)
二	乱世悲凉淡化后的养性炫才·····	(297)
三	在风流和礼防共构中欣赏人间情欲·····	(299)

四	在玄怪幻想和时空错乱中反省历史·····	(302)
五	从意象叙事到话本趣味的影响·····	(306)
第十三章	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	(311)
一	“三教归心”的精神纽结和超宗教自由心态·····	(311)
二	个性神群体及其精神哲学隐喻·····	(317)
三	神魔观念重构及其拓展的幻想空间·····	(324)
四	神秘数字和神奇情节相组合的结构体系·····	(330)
第十四章	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	(338)
一	“世情—奇书”的审美旨趣悖谬双构·····	(338)
二	文人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多层次戏拟·····	(339)
三	对正统哲学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机·····	(342)
四	“情欲与死亡”母题和人物“三绝”·····	(345)
五	叙事语言系统的变革和意象性·····	(348)
六	结构的“道”与“技”以及对生活原生态 靠拢·····	(353)
第十五章	李渔小说：程式化和个性化的审美张力·····	(359)
一	投入托钵山人、快乐浪子的复杂自我·····	(359)
二	“三美俱擅”原则和“才貌风流”正反模式·····	(367)
三	名士、戏曲家、园林嗜好者对话本体制的 改造·····	(374)
四	“俗中求雅”和喜剧化语言风格·····	(382)
第十六章	《聊斋志异》充满灵性的幻想和叙事方式·····	(390)
一	蒲松龄寻找精神系统·····	(390)
二	颠倒的世界和沉重的幻想·····	(391)
三	灵魂幻想的乡野气息和灵秀不俗·····	(395)
四	花妖狐魅的笑影和诗情·····	(399)
五	以生命精华激发叙事体制活性·····	(402)
六	在博取传统和投射作家心灵光影之间·····	(407)
第十七章	《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	(411)

一	百年文化反思和“叶子”式结构体制·····	(411)
二	把清事推至明朝后的“帝都情结”和 “精神家园”·····	(416)
三	瞬息烟尘中的真儒理想和名士风流·····	(424)
四	“瞬间百年”时空操作中的悲喜剧和智性美·····	(431)
第十八章 红楼梦：人书与天书的诗意融合·····		(440)
一	“天·人”奇书品格与复合视角·····	(440)
二	生活原生态和对比原则的张力·····	(445)
三	“影中影”描写术和悖谬性扭结·····	(449)
四	神话素意象和预言叙事的多维性·····	(453)
五	真幻雅俗错综的时空结构及其人文化·····	(459)
第十九章 《红楼梦》与五四小说·····		(467)
一	在“神圣施、曹，土芥归、方”思潮中·····	(467)
二	“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和悲剧文学形态·····	(473)
三	个性思潮的解读和汲取·····	(477)
四	对妇女和婚姻爱情问题的妙悟与误认·····	(481)
五	描写手法的模仿、点化和转型·····	(486)
第二十章 《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智慧·····		(493)
一	以王充、应劭杂说改造志怪文体·····	(493)
二	陷入开明的迂腐和困惑的固执的文化怪圈·····	(496)
三	以博学老者晚秋气象讥评传奇小说青春气息·····	(499)
四	借幽怪以阅世和归隐于心的孤独感·····	(501)
五	学问家笔下的“狐鬼”和狐鬼中的 “学问家”·····	(504)
六	叙事功力和反虚构之间的张力·····	(507)
七	复式视角和“元小说”·····	(510)
结论 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		
——对二千年小说叙事的综合考察·····		(514)
一	文化对行原理与易行、道行图谱·····	(514)

二	潜隐圆形结构对应于审美理想及其适应性和 涵容力.....	(518)
三	圆的破裂与参数叙事.....	(523)
四	阴阳两极共构的叙事动力学及其四种表现 形式.....	(528)
五	视角的群体流动性、层面跳跃性和玄学性.....	(533)
后	记.....	(540)

导 言

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阐释 和文体发生发展论

一 本体认定和“小说”语义分析

中国小说在其自古及今的漫长发展中，文体形态异常丰富和复杂。甚至令人感觉到，小说一门几乎成了文学领域众多不登大雅之堂的拉杂文体的“收容队”，它出入于典籍和民间，收容了志怪、传奇、笔记、话本和章回，给人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感。那么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文体形态，是否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本质存在？只有从本体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我们的小说研究不致偏离我国小说的本来意义及其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研究必须返回本体，返回所研究对象的本原和本性，才能原原本本地恢复我国小说发展的真实过程，而不是被某种外来观念肢解割裂了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小说研究必进行自身的本体认定，才有可能形成切切实实属于它的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国学者对古典小说的研究，大多采用西方的小说观念，这对于小说评论脱离古老的、零碎的评点状态，形成比较深广的理论形态，无疑是有着历史意义的。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实际上隐藏着某种理论视角的错位。事实很清楚，我国小说文体概念的出现，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它的命名和耶稣一

样古老，它不需要采用西方千百年后才出现的小说观念来规范自己的想象力和表现形式。勿须怀疑，我们需要西方现代小说观念作为研究的参照系，这是绝对必需的；但是参照系不能代替本体认定，这也同样不容怀疑，不然就可能造成研究偏离本体，影响它的科学品格。鲁迅打破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著成开创性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借鉴了西方的小说观念和文学发展观的，但他也感觉到讲中国小说史，不能不追踪中国小说的命名，首先介绍《汉书·艺文志》：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要进行中国小说的本体认定，对于“小说”作为目录学概念首次进入正史的这段话，必须建立两点认识：第一，这个术语不是班固个人的创造，而是两汉之际一批极有成就的文献学者对积如丘山的各种书籍，进行讨论辨析，郑重地确定下来的文体命名。自从秦始皇焚毁诗书百家语和秦以外的诸国史书之后，经过汉高祖、武帝两朝的收集整理，“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①，这就刺激了两汉之际校讎整理群书的工作和学问的产生。刘向典校经传、诸子、诗赋，提要结集为《别录》，刘歆子承父业，分类而奏上《七略》。《汉书·艺文志》就是汲取刘向父子的成果，对《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的。当时文献学者群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桓谭。他与刘歆同时，称赞刘向父子是“通人”，“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②。他的《新论》说：“若其小说家，合残

① 《全汉文》卷四十一辑《七略》佚文。

② 《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

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① 这番议论不应孤立对待，甚至不应看作桓谭个人的意见，而应该看作是一个文献学者群数经“辨析疑异”之后他个人的领会。它可资与《汉书·艺文志》关于“小说家”的论述相互参照，是一个博学家群体的创造。

第二，“小说”这个目录学术语的语义学内涵是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毫不夸张地说，甚至比许多语种千百年后创造的同类术语的内涵还要丰富和深刻，只不过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加以深入的挖掘和发现而已。“小”字有双重意义：一种属于文化品位，它所蕴涵的是“小道”；一种属于文体形式，它的表现形态是“残丛小语”。这里自然含有某种对小说歧视的成分，但是以“小道”视之，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否可以容纳更多的作者不受圣经贤传约束的个性？

“说”字的语义就更为微妙，起码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阐释。首先是文体形态层面，有说故事或叙事之义。《韩非子》有“储说”、“说林”的篇目，王先慎《集注》说：“索隐云：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这些篇目之下是收集了不少故事的，应了古语所谓“物有本末，事有始终”^②。刘向对于这层意思心领神会，他典校群书之日，对“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的部分进行清理，“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③，这就是他编撰的《说苑》。《说苑》的命名是与《韩非子》的“说林”有渊源关系的，它的“事类众多”也和“说林”的“广储诸事”相通。顺理成章，被《说苑》删落的“浅薄不中义理”的别集《百家》也就成了小

① 《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从军诗》注引《新论》。

② 《礼记·大学》。

③ 刘向：《说苑序奏》。

“说”，这也是《七略》或《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部分按年代最后著录“《百家》百三十九卷”的缘故。

其次的语义属于表现形态，“说”有解说而趋于浅白通俗之义。《说文解字》曰：“说，释也。”就是这层意思。考虑到《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与刘向父子年代相续，与班固同时，因此《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为“小说家”立名之时，是不能摆脱这种语义学上的纠缠的。

其三的语义属于功能形态，“说”与“悦”相通，有喜悦或娱乐之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释，即悦悵。说，悦；释，悵，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悵二字。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段氏作注时，是考虑到《诗经·小雅·頍弁》有“既见君子，庶几说悵”之句，因而把“说”解释为喜悦了。

由此可见，“小说”名目的确立，是一个博学的学者群进行精心的语义选择的结果。它包容了这种文体基本特征的故事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开始是在短小的篇幅中，展示了为圣贤“大道”所鄙视的思维结果，以及不为经史典籍的文体规范所约束的美学个性。由于这种文体处于正统文学总体结构的边缘地位，它没有受到认真的重视和严格的界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精芜混杂，界限模糊，收容了不少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它的杂色文字。但也由于它的界限模糊，较少清规戒律，也容纳了许多不受规范束缚、不拘传统格套的，因而是新鲜的或充满野性的才华。加上它的故事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等基本特征，又联系着人类好奇、乐生的天性，联系着人类宣泄苦闷、表现自我的内在欲望，它那种为正统文学观所排斥的文体价值，却在人类本性和智慧上获得了更带本质意义的肯定和说明。因此可以说，“小说”名目确立的学者辩释过程及其深刻的语义学蕴涵，为我国小说的本体认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小说发端于战国及其互体形态

如果承认《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具有本体认定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不能轻视该志所著录的古小说文献在小说发生学上的价值。而且由这些古小说文献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小说发端于战国。

战国时期是中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但也是文化思想充满着创造活力的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家们借助人物的或动物的故事，真实的或虚构的故事，隐喻着和论证着各自别出心裁的思想体系。史学已经趋于成熟，神话幻想却没有消退，反而被一些思想家用以建构自己的宇宙模式。诸子祖述黄帝、尧、舜，借时间幻想来建立道统；各国诸侯攀援颡项、稷、契，从血缘系统上论证自己的正统。其时思想尚未定于一尊，诸子说理不能依恃空言，必须含玄理于生动形象的故事情节之中，从而刺激了文学叙事的譬喻性。降至战国中晚期，在一些思想家思考富国强兵的实用政术的同时，另一些思想家则参悟天道，思考宇宙构成和运行的模式。庄周之外，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时人称为“谈天衍”。^①“易传”思想形成于战国中晚期，却借助“伏羲作八卦”的神话以增加其神圣感和神秘感。儒、道、阴阳家之外，被称为杂家的《吕氏春秋》取《礼记》之《月令》为其“十二纪”的结构框架，春令多言生而冬令多言死，夏令多言乐而秋令多言兵，“因四时之序而配以人事，则古者天人之学也”^②。

除了文化思潮之外，士这个阶层的动态也值得注意。客卿、游士现象的出现，说明群雄逐鹿环境中对人才的重视和对思想控制的松弛。顾炎武《日知录》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

①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②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四《吕氏春秋》条。

始于《管子》（原注：《谷梁》成公元年传亦云）”，“春秋以后，游士日多”，“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①。如果承认古文献专家余嘉锡考证的小说所出自的“稗官”就是“士”，^②那么战国时期就具备了这种文体产生的极好条件。因此无论从思潮的、还是人才的历史契机而言，战国文化都是孕育中国古小说的合适的母体。

这一点可以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小说文献中，得到具体的例证。“汉志”著录小说十五家，明显地分为两部分、或两种类型：《封禅方说》至《虞初周说》五家，大体注明为汉武帝、宣帝时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据此称“小说兴于武帝时矣”^③。“汉志”按时代顺序编录，此前的《伊尹说》至《黄帝说》九家，多注称“依托”或“古史官记事”，当是战国游士之风至汉初黄老之风的产物，因为这些时期的风气比汉武“独尊儒术”之后更有利于小说家滋生。《百家》本是乱简，不排除有相当部分是先秦至汉初的遗物，经刘向整理出的《说苑》，材料来源便如此。这就意味着“小说兴于武帝时”的说法，有必要推前到战国。

这些古小说中保留较完整者，是《吕氏春秋·本味》篇转录的《伊尹说》故事：

有伋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嬖人（即庖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白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这是一个小说与神话的互体，它包含着一个“空桑生伊尹”的

① 《日知录》卷七《士何事》。

② 《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小说家类”序言。

异生神话，和古老传说中“姜嫄践巨人迹而生稷”，“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可资参照，只是带点水灾和蚕桑业出现的痕迹而已。接下来的叙述就带点战国游士的气息了。伊尹是作为陪嫁的奴隶而成为商汤王的臣子的。他用烹调术游说汤王，认为必须备足珍禽异兽，掌握调料火候，精通“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才能做出美味佳肴，这是与“圣王之道”相通的。这番游说之辞排比铺陈，夸饰异方奇物，曲谈天道人道，是带点战国纵横家和阴阳家的口吻的，可以看作小说与子书的互体。《说文》禾部释“秬”字，《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应劭语，在转述这期间的一些文字时都称为“伊尹曰”或“伊尹书”，可以推断它极可能就是“汉志”所载的《伊尹说》。《吕氏春秋》著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因此《伊尹说》最迟也是战国晚期的作品了。如果承认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小说书的片断，那么我们就不难窥见最早小说出入于民间口头传说和士人风习，兼容着神话和子书的互体形态了。最早的小说不是先有文体定义，才去写作的，而是已经在写小说、却不知自己写的是小说的自在状态中，开始了自己文体发生学的最初行程。

小说发生学最初行程的这种自在状态，不仅使得小说家不知自己写的就是小说，而且使得后世的目录学家也难作判断，往往把某些早期小说列入其他文体系统。比如《晏子春秋》并非晏子自著，乃是后人假托晏婴之名，收集轶事编成。一种依据民间传闻的假托之作，当然富于虚构性，称它为小说集是最符合实际的。它成书很早，《史记·管晏列传》已著录《晏子春秋》。但它的命名很怪，“晏子”是子书之名，“春秋”是史书之名，来了一个子、史合璧的“四不象”。这本是小说发生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甚至是小说家按照当时的文体价值观想通过对子、史文体的依附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也有可能。但是历代目录学家对文体发生初期的这种混沌状态和自在状态浑然不加辨析，时而把此书列入子部，时而把此书列入史部传记类，使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长期离

乡背井。

其实，只须认真地研究《晏子春秋》的文本就不难发现，它的许多篇章已经具备小说叙事的必要成分，已经毫无逊色地位居最早的短篇小说精品之列。《内篇·谏下》有一则“二桃杀三士”，写了三位以“勇力搏虎”而闻名的武士，只因晏子从面前经过时不起立致敬，有点不恭吧，就被晏子在齐景公那里奏了一本：“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这里似乎表现了晏子察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的政治家敏感。他以两个桃子，让三位武士“计功食桃”，毫不费力地杀掉他们，也显示了这位政治家智谋过人。接下去的描写就使全篇的格调为之一变，充满着激昂慷慨的情感，充满着机会不多、谋之者众的沉重的人间悲剧感。第一位武士自觉有搏虎之功，不受桃是无勇；第二位武士认为“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有“开疆之功”，理所当然可以吃桃。第三位功劳最大，他像河神一样在黄河中和巨鼉搏斗，有救驾之功，但已经没有吃桃的机会了，只好拔剑要前两位交出桃子来。功大桃小，形成某种略含荒诞感的对照，而小小的两个桃子，竟能够在片刻间杀死三个山上猛虎、河里巨鼉、阵前三军都无法奈其何的超级武士，这就在巨大的反差之间显示了非常可观的描写力度。前两位武士感到功劳不及第三位，不让桃是“贪”，不死是“无勇”，都自杀了。第三位也感到“独生不仁”，同归于尽。在这三位武士勇于事功，慷慨殉义的行为面前，晏子的奇谋未免有些残酷，他不能引导三武士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反因他们的些微不礼而置之死地。进一步深思可以发现，三武士之死既是晏子计谋的完成，又何尝不是他的计谋的反讽？“二桃杀三士”成了后世形容追求者众而机会少的情景的带悲悯性典故，盖源于此。从其描写力度，从其对传奇性、反讽性和悲剧性的融合，这篇早期小说已经甚为可观了。

《晏子春秋》和《伊尹说》片断，代表着我国小说发生初期的